

第一章

传说与真实——先秦时代中西关系的初曙

- 黄河流域与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的交往始于先秦时代
- 古希腊希伯波里安人的传说可能是欧洲关于中国的最早知识
- 赛里斯和秦尼国是古代西方对中国的称呼

先秦时代是中西关系的萌芽时期。这时期的中西关系，就像东西方各民族自身的历史一样，充满了神秘和离奇。周穆王西巡见西王母、神秘的希伯波里安人、赛里斯和秦尼国……历史的真实与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如歌、如诗、如画

一、周穆王西巡见西王母

周穆王，历史上实有其人。他是西周立国后的第 5 位天子。《史记·周本纪》里说他即位时已 50 岁，在位有 55 年，就是说他活了 105 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黄河流域流传着这位英武的天子西巡见西王母的故事。

也许这又是一段“层累地构造的历史”。《国语》里说“穆王将伐犬戎”。《左传》里讲“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史记》则描写得比较具体了：一位名叫造父的优秀驾车手因善驾为穆王所器重，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晚出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的描写就更细致了，有穆天子会见西王母的时间、地点、场景与故事。说是穆王在即位的第 17 年，由秦族的祖先造父驾着马车西巡到昆仑山，在那里与西王母畅饮于瑶池之上，有歌舞助兴，鼓乐喧然。据说昆仑山是一片美好的乐土，到处“鸾鸟自歌，凤凰自舞”，老百姓们食凤凰之卵，饮甘露琼浆。

西王母是何许人也？自来便说法不一。清代四库馆臣们说：“西王母者，不过西方一国君。”剥去了她身上神秘的面纱。也有人与西方典籍相印证，说西王母乃阿拉伯南部古

代一叫示巴 (Sheba) 的古国的女王。《圣经》“旧约·列王纪”里有示巴女王往见以色列王所罗门的故事，其时代正约略与周穆王时代相当。《史记·大宛列传》说西王母在“条支西近日所入”迹近地中海岸。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则西王母石室位于祁连山南麓，等等。也就是说，穆天子所见的西王母所在地，竟从河西走廊延伸到阿拉伯国家，甚至西亚、欧洲。由于记述此事最详的《穆天子传》乃小说家言，又系晚出，许多人因而怀疑周穆王见西王母未必真有其事，甚至西王母也未必真有其人。但是，这个故事本身却说明了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对中亚及西亚地区已经有了一些历史地理知识，也反映出早在公元 10 世纪以前，黄河流域与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已经有了比较牢固的联系。据说周穆王西巡时带去了大量丝绸、铜器、贝币，赠予所到之处的酋长，各地酋长也回赠以马、牛、羊、酒和玉石之类。这种赠物贸易反映了当时中西之间物质文明上的互通有无关系。

其实，考古资料表明，黄河流域同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的交往比周穆王（约公元前 1001—前 974）还要久远。石器时代，中外居民就有某种间接的或偶然的接触与相互影响。青铜时代中国的殷商文明远在周边诸国之上，商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和制造工艺都会对周边国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人们在前苏联贝加尔湖地区发现的卡拉苏克文化（时间约当公元前 1200 年至前 700 年，即中国的商周时期）遗存中，找到了在形制上与安阳出土的商代文物类似的陶鼎、陶鬲 30 余件。青铜刀和半圆形装饰品是卡拉苏克文物的最典

型物品，其中可以看到商代青铜文明的痕迹，因为它们在形制、材料上与安阳出土的商代文物完全一致。内蒙古出土的铜铎、铜戈，就好像是卡拉苏克式铜戈的模型。原苏联学者也认为，今内蒙地区的铜器有可能是古老的商铜器标本与卡拉苏克式铜器之间的中间环节。另一方面，伏尔加地区发现的塞伊姆文化时代在公元前 14 世纪至公元前 8 世纪，比安阳商文化为早。安阳出土的青铜兵器也有与塞伊姆文化中同类文物接近之处。只是塞伊姆文化的青铜刀柄端装饰的整匹野马，在商代青铜刀柄端变成了马头；塞伊姆式空釜斧的简单纹饰，在安阳出土的铜斧上变成了饕餮纹饰。

根据某些事实推测，早在殷商时代就有人从中国北部迁到叶尼塞河流域。人们对卡拉苏克人骨的研究说明，来自华北的蒙古人种曾大量渗入该地区，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人种的迁移和文化的传播至少在 3000 多年前的欧亚草原上已经相当频繁。学者们认为当时从华北进入南西伯利亚的民族就是中国史书上的丁零人，商周王朝几次对翟族（丁零别名）鬼方的进攻，是迫使该族向北方草原迁徙的原因，所以丁零人的分布恰好与卡拉苏克式文化的分布相吻合（参见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19 页）。

进入春秋时代，中原诸国对周边戎狄部落展开了攻势，特别是秦国向西扩展空间，是几代人追求的事业。到秦穆公时代，遂称霸西戎，西戎无力东顾，被迫西迁，从而引起了公元前 8 世纪中亚民族的大迁徙。希罗多德等西方学者笔下的斯基泰人据说就是中文史料中的九州戎。他们从东北向

西南移动,于 7 世纪中叶出现在中亚。斯基泰人本为亚述帝国的友邦,公元前 612 年忽然会同其他游牧民族攻破亚述都城,这距秦穆公逐九州戎不过十来年。

战争与民族的迁徙促进了文明的交流。西方人最早所知道的中国以“秦”为代表显然与斯基泰人西迁有关。中国文化也受到斯基泰人的影响,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近看是学自匈奴,远看则是受到斯基泰文化的影响。从公元前 8 至前 4 世纪,斯基泰人分布在从黑海到西伯利亚之间,他们吸收亚述文化、古伊兰文化、古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斯基泰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斯基泰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动物纹饰和带钩也都通过匈奴人而传入中国。

总之,尽管周穆王西巡见西王母的故事充满了想象与神奇,但它背后所包含的历史真实却是丰富多采而又确凿无疑的。

二、神秘的希伯波里安人

与黄河流域流传着“西王母”故事相类,地中海边的古希腊也有一段关于远东的希伯波里安人(Hyperborean)的动人传说。

在巴尔干半岛与小亚细亚之间的马尔马拉海中,有一个美丽的小岛。岛上住着一位名叫阿里斯特(Aristeas)的传奇性旅行家。旅行家写了一首《阿里玛斯培》(Arimaspea)的叙事长诗,诗中记述了他的一次远东旅行,提到了许多东方民族,还有怪异的动物,雕头狮身的金库守

卫神。自希罗多德以来，有许多西方学者不断地试图给这些民族定位。因此，尽管阿里斯特的叙事诗早已散佚成零篇断简，而他介绍的故事却由于在西方享有“历史之父”盛誉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转述而广为世人所知。

诗人笔下提到的希伯波里安人居于最东部，遥远的北风吹来的地方。他们神圣、纯洁而善良。那里群山环抱，气候宜人，没有仇杀、没有战争，人们都长生不老。诗人说，主神宙斯之子洛格里斯就是从希伯波里安人那里获得长生不死的金苹果的。除了神仙和英雄，凡夫俗子是无法进入这片乐土的。被妒火攻心的天后赫拉驱赶的宙斯的情人嫫娥，也只能被赶到希伯波里安人的西邻阿里玛斯培那里去，再远一些是不可能的。

关于诗人阿里斯特其人，自来便众说纷纭，评价不一。有人说他神秘兮兮，是活脱脱的毕达哥拉斯派的信徒；有人说他记事信实，不愧为《荷马史诗》作者的老师；有人说他的记载只是萨满教徒的神游梦呓；更有人骂他是江湖骗子。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阿里斯特生活在公元前 7 世纪的后半叶，希伯波里安人的故事在他之前很可能就已经流传。以《农作和日子》、《神统记》等诗作而闻名的古希腊杰出诗人赫西俄德（公元前 8 世纪）就提到过希伯波里安人，稍后的著名叙事诗人平达（约公元前 518—前 446 年之后）也将关于希伯波里安人的故事追溯到公元前 7 世纪以前。到了 19 世纪晚期，两篇德语文献提出大胆猜想，认为善良温和的希伯波里安人（德文作 Hyperborer）就是古代的中国人。本世纪 60 年代，又有全面整理阿里斯特长诗的英国学者进一步

证实阿里斯特的东方之旅确有其事。说他不是希罗多德所认为的那样是上帝显灵于人世，倒很可能是一位阿波罗神甫（阿波罗为主管光明的神），他旅行的目的就是要到幸福的希伯波里安人那里去。根据古希腊神话，主管光明的神要到那个地方度过冬天，并享受 100 条驴的隆重祭典，然后再乘坐天鹅御辇回到天堂。阿里斯特的这次旅行可以说是一次“朝圣之旅”。他为了寻找上帝的故乡首先来到了俄罗斯，顺着北风之神的指引，顶着西伯利亚的寒流，继续往东行，一直走到了中亚腹地。

本世纪 90 年代初，又有德国学者在研究早期中欧关系时，再一次肯定阿里斯特笔下的希伯波里安人的故事是欧洲关于中国的最早知识。人们解释希罗多德《历史》中曾记述过的公元前 8 至 7 世纪那场民族大迁徙时都说，当时所有的蛮族都卷入了那场亚欧民族的流动之中，唯独安静的希伯波里安人例外，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安分的农耕民族，与斯基泰那样的游牧民族不同。人们考证出与之相邻的阿里玛斯培人是蒙古种族，他们对黄金的追求（雕头狮身兽守护金库之类），甚至可以从蒙古语中阿尔泰山即金山的命名中看出来。还有人把山脉南边及西南边的伊塞顿（Issedon）人解释为中国文献中提到的乌孙人。总之，阿里斯特的记载足以使人相信，他几乎就要达到远行的目的了，希伯波里安人就在他不远的前方，只是遇到非人力所能克服的障碍，他才无缘进入那片幸福的乐园。乌孙人向他讲了许多恐怖的故事，这使后人想到，是那些居间牟利的商人的诡计。也许他们不愿放弃东西贸易的中介地位，于是编了许多吓人的鬼

话，就像汉代甘英后来在安息条支碰到的情况那样。

总之，阿里斯特的描述长期影响着西方世界对东方的认识。正是他的故事描述了从顿河到阿尔泰山的这个草原走廊上的各种景观与各个民族。这条草原走廊实际上存在着一条欧亚大陆间的商业通道。阿里斯特的东方之旅，谁能保证不是一次出于商业目的旅行呢？也许是为了做黄金、皮毛生意，也许还有大黄生意，因为大黄正是乌拉尔山及阿尔泰山地区特产的贵重药材。

三、赛里斯与秦尼国

如果说希伯波里安人的国家更像一则美丽的神话，那么丝绸之路上传来的柔软亮洁的丝绸，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如果说希伯波里安人只被一部分学者证明是中国人的话，那么赛里斯(Seres)和秦尼国(Thinai)则被公认为古代西方对中国的称呼。

古典时期西方关于亚洲和远东的认识是与希腊、罗马时代的地理学成就分不开的。大体说来，亚历山大东征以前，欧洲人对亚洲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最早的西方地理学家把里昂河作为欧亚大陆的分界线。希罗多德把亚洲分为上亚洲和下亚洲。希腊人对美索不达米亚以东地区的认识基本上模糊不清，印度当时被视为世界的末端，在地理家的笔下，过了印度就是一片沙漠了。斯基泰地区被描写成一个方块，位置大体相当于南俄罗斯的范围。这里按南北方向依次被划分为没有树的灰色草原、有树的草原和荒漠草原，再向

东便是乱石遍布的狩猎民族之地，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而在高山山麓地区（可能相当于阿尔泰山山麓）居住着一些采集野果为生的民族。

亚历山大（公元前 356—前 323）远征以后，一个未知的神秘的亚洲展现在欧洲人面前。亚历山大的军队前锋曾到达阿姆河、乌浒河和锡尔河（药杀水）之间的粟特地区。欧洲人不得不全面修正对世界的认识，因为人们发现锡尔河、印度河以东还有大批陆地。亚历山大的军队曾到喜马拉雅山砍伐木材，打造进攻印度的船队。于是，关于东方的传闻多了起来。从亚历山大的部将俄内西克里特（Onesicritus）的嘴里就传出这样的故事，说是曾在波斯王宫任御医多年的克泰西亚（Ctesias）在《印度记》中记载过远东的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一样身材高大，寿逾 200 岁。亚历山大的另一位部将尼亚古（Nearchus）据说在屯驻北印度时曾见过赛里斯人所制作的衣袍。这些可以说是欧洲文献中有关赛里斯的最早记载。

亚历山大的东征，不仅仅是增进了西方对远东地区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古希腊文明随着亚历山大军队的铁蹄经中亚、阿富汗，而终于同印度的佛教文明相遇。亚历山大在亚洲的遗产留给塞琉古一世后，塞琉古王朝与印度孔雀王朝（约公元前 324—前 185）或战或和，交往频繁密切。阿育王时期建立起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使佛教在中亚、波斯乃至希腊、埃及地区都有传播。希腊文明与古印度文明在西域地区相碰撞，结出了新的文明的果实，这中间当然也有中国文化的影响。至迟在公元前 4 世

纪中国丝料就已输入到印度，古梵文里许多与丝有关的词汇，都与它的原产地“支那”（China）这个词有关。

“支那”（China）在欧洲的文献中又拼作“秦尼”（Thinai）。“秦尼”最早见于公元前 1 世纪某佚名作者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中。这个时期由于罗马人的积极活动，地中海东西两端的门户已经打开。在西边，通过西班牙和高卢的港口，可以通向大西洋；在东边，通过与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加强了同红海、印度洋以及中亚内陆的联系。

《航海记》的作者可能是一位定期与印度做生意的商人。他所说的厄立特里亚海包括红海、阿曼海和印度河地区。他的东段航程经过印度河口、斯里兰卡、恒河河口。若再往前行，就是克里塞岛和秦尼地区，克里塞岛就是今天的马六甲半岛，秦尼则相当于中国的南部地区。这是欧洲人第一次谈到从海路接近中国。

希腊罗马时代的学者们追求一种对世界整体的认识。他们极力想描述有人类居住的地球的真面目。他们探索地球的形状，推测人类居住地的长度，计算通往各地的里程，总想集大成地编纂出关于自然和人类的百科全书，遥远的东方当然也在他们关心之内。如纪元前后的著名学者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 64—公元 23）在 17 卷的《地理书》中记载地球圆周长 252000 希腊里，修正后为 39000 多公里，与地球的实际周长 40000 公里已很接近。但他对赛里斯仍只能重复“寿逾 200 岁”的古老传说。公元 1 世纪的梅拉（Pomponius Mela）在《地理志》第 1 卷中说亚洲的东方有印度人、赛里斯人和斯基泰人，“赛里斯人住在临

近东海岸的中心，而印度人和斯基泰人却栖身于边缘地带。”公元 2 世纪的古罗马杰出地理学家托勒密（Clandius Ptolemy）又根据前人的各种记载，总结性地描述了赛里斯和秦尼的方圆四至、主要城市及其经纬度。他在所著《地理书》中的《人类栖息地区图简述》中说：“我们所居住的这部分地域四至如下：东部是大亚细亚，越过秦尼和赛里斯国诸部等东方民族之外是一片未知之地；南部同样也是一片环绕印度海的未知之地；北部未知之地位于越过大亚细亚北部、萨尔马特(Sarmatie)、斯基泰和赛里斯国之外。”托勒密曾经计算过距赛里斯国首都赛拉城（Sera）和秦尼国首都秦奈（Thinai, Sinai）的路程，根据是一位名叫梅斯（Maes）的富商留下的记述。这位富商虽然没有亲身到过赛里斯，但是他们经常派人从幼发拉底河前往石塔地区（帕米尔山地的塔克库尔干），又从石塔再到赛里斯的首都赛拉，仅后者就有步行 7 个月的路程。托勒密认真地校正前人在计算中的短缺，比如考虑到风雨的阻隔及道路的迂曲等因素，他精确算出从幼发拉底河河道到石塔的距离为 24000 希腊里，而从石塔到赛拉城的距离当为 18100 希腊里。

托勒密的著作有 26 幅地图，亚洲占 12 幅。在第 8 卷中的附图介绍文字中，有对赛里斯和秦尼国家与都城的进一步的地理描述。虽然其中许多古怪的地名，也许永远不会有人能够弄清楚是什么地方，但是秦尼的西北是赛里斯人，印度的东北是秦尼人，他们居住在人类的最东端，这些则是十分清楚的。毫无疑问，秦尼和赛里斯应该就是古

希腊罗马时代的欧洲人从地理方位上所能确定的包括今天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的概念。

第二章

胡天汉月——秦汉时期中西关系的开拓

- 汉武帝时代迎来中西文化关系第一次高潮
- 匈奴西迁为东西文化交流增添丰富内容
- 张骞通西域打开中西直接交往的大门
- 中国丝绸在罗马世界流行开来

世人总是将秦始皇与汉武帝并提，所谓“秦皇汉武”是也。就开疆拓土、雄才大略而论，秦皇汉武各有千秋，但就拓展中西文化关系而言，则秦始皇似乎要逊色于汉武帝。与秦始皇热衷于修长城不同，汉武帝致力于抗击匈奴、经营西域；与秦始皇派徐福到东海去寻求长生药不同，汉武帝醉心于引进西域地区的物质文明，从而迎来了中西文化关系的第一次高潮。

在欧亚大陆的西头，强盛的罗马帝国一度成为横跨欧亚非的世界性帝国，与东边的秦汉帝国相辉映。在两大帝国之间有许多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匈奴在汉朝打击下的西迁，促进了中亚一些民族的迁徙，从而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增添了丰富多采的内容。

一、张骞通西域

汉武帝时张骞（约公元前 167—前 114）出使西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划时代事件。至于汉武帝为什么要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则必须从汉匈关系谈起。

匈奴是秦汉时代的北方草原帝国，秦始皇之所以修万里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匈奴。公元前 209 年，即汉高祖刘邦即位的第三年，一个名叫冒顿的新单于杀父自立，建立了一个更为强有力的新的草原帝国。他不仅统一了草原上匈奴各部，而且向东击溃强大的东胡，向西逼走游牧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人，向南重新占领了秦朝大将蒙恬当年从匈奴手中收复的河套地区。面对匈奴咄咄逼人之势，汉高祖在公元前

200 年冬亲率 30 万大军远征，不想却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被匈奴军队围困达 7 天之久。从此 汉朝对匈奴采取了“和亲”的政策。即一方面将汉朝的公主嫁给单于为妻 另一方面要赠送给匈奴数量巨大的“礼物”包括丝绸、粮食及酒等。以后，每一个新即位的汉朝皇帝，都给匈奴送去一位公主和大量财物，匈奴的气势却越来越嚣张。公元前 192 年，冒顿甚至写信给寡居的吕后，要求娶吕太后为妻，吕后只好以“年老气衰 发齿堕落”为词婉拒（《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

汉武帝 公元前 141—前 87 即位之后 仍然维持着和亲政策。这时汉朝内部政治已经巩固，经济与军事的实力也大大增强 反击匈奴的时机已到。但千里沙漠 用兵不易 单是士兵及马匹的粮草补给，就不是易事，所以汉朝需要一个同盟者。从匈奴的降兵中，汉朝得知月氏乃是匈奴的世仇。武帝希望与月氏结盟，“断匈奴右臂”，于是，下令公开召募出使西域的使节。汉中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东）人张骞以郎官之职慨然应召，从此开始了他的传奇生涯。

公元前 138 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张骞带领堂邑氏的胡奴甘父（此人可能是他的向导）及 100 多名兵士离开长安 取道陇右 向西进发。途中不幸被匈奴所俘 单于听说张骞要去大月氏 大怒道：“月氏在吾北 实际应是西）汉何得以往使。吾欲使越 汉肯听我乎？”单于扣留下了张骞 并且赐给他一个匈奴女子为妻。看来匈奴并没觉察张骞出使月氏的真实目的。

张骞在匈奴一呆就是十来年，胡妻为他生了儿子。最

后他终于找到一个逃脱的机会，又向西走了几十天才到达了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大宛人知道汉朝富庶，很想同汉朝建立联系，见汉使就在眼前，非常高兴。张骞向他们说明来意，是为了出使大月氏，希望大宛能够派人护送汉使到大月氏，说待他回到汉朝后，汉朝一定会以大量财宝酬谢大宛。大宛国王欣然同意。

当张骞在大宛译者与向导陪同下，经过康居，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大月氏时，可以想见其心情是如何激动。大月氏女王也非常惊喜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汉使。但是当大月氏人知道汉朝是想寻找攻打匈奴的军事同盟者时，却久久不作答复。原来大月氏人也有自己的苦衷。想当初，月氏人在河西走廊一带游牧时，势力何其强大，曾迫使匈奴人送子作人质。这个质子就是后来逃回匈奴、杀父自立的冒顿单于。冒顿熟知月氏底细，频频发动进攻，月氏人被迫从河西走廊西迁，先到了天山北麓的准噶尔盆地，进而再迁至伊犁河流域。只有极小部分人越过祁连山而南，与当地羌人杂居，史称小月氏。西迁的月氏被称为大月氏。大月氏在伊犁河地区没过多久，又遭到有杀父之仇的乌孙人的袭击，于是被迫三迁，取道大宛而南击大夏，并且占有了这块地方。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是一块土地肥沃的宝地，十分适合于农耕。受大夏人影响，大月氏人渐渐放弃了游牧，而转向农耕定居，生活安逸。在这个时候，远方的汉使要想劝大月氏再去与匈奴搏击，谈何容易！所以张骞在大月氏呆了一年多，总也得不到对方的肯定答复。这期间，他有心探访了西域各地风俗人情、山川远近。有一次，他竟然发现市肆中出售中国

四川出产的邛竹杖和蜀布。邛竹是一种方形的竹子，可以做器具、棍杖与装饰品。远在蜀中的土产是怎么运到大夏来的呢？他百思不得其解。询问后知道，从四川往西南走，可以通往一个叫身毒（印度）的国家，从身毒西北到大夏就有大道可走，邛竹杖和蜀布就是从这条路线运来的。

张骞决计返国，向汉武帝报告西域的见闻。这回他走的是南山即昆仑山的北麓。没想到中途又被匈奴人抓住，扣押了一年多。后来趁匈奴人内江，他再次逃脱，带着他的胡妻与一个随从回到了长安。其时已是公元前 126 年。去时张骞只是 30 岁左右的小伙子，如今已是四十三四岁的中年汉子了。

张骞向朝廷详细报告了在西域的见闻，介绍了大宛、康居、大月氏、乌孙、安息等国的情况。说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在匈奴西南，是农耕民族，种稻麦，有葡萄酒，产天马，又名汗血马。而乌孙在大宛的东北，是游牧民族，风俗与匈奴同。康居（大致在锡尔河中下游及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在大宛西北，风俗与位于大宛西边二千里的大月氏同。安息（伊朗）则在大月氏以西数千里，也是农耕城居的国家，城邑像大宛一样，种稻麦，产葡萄酒，以银为钱，上面印有王的头像，以皮革为纸记事，是西方最大的国家。安息之西又有条支（叙利亚），北则有黎轩（罗马），大夏（阿富汗）在大宛西南，大夏的东南则是身毒（印度），其土俗与大夏同，都是城居农耕民族。上述汉朝人在公元前 2 世纪关于中亚、西亚、印度及罗马帝国的认识，都是由张骞第一次获得的。现在还保留在《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里，成为研究